



## 目 录

瞧，他们走来了

- “漢批评丛书”总序 ..... 吴义勤 员  
 自序：遥远的行程 ..... 员

文化批评

时空流转现代

- ~~员~~京京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 ..... 员  
 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  
 ——对 ~~员~~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 ..... 苑  
 以父轳轳重叙当代史  
 ——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意识形态批评 ..... 苑

思想史

挪用与重构

- ~~员~~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 ..... 远  
 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 ..... 苑  
 “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  
 ——“文学性”问题在 ~~员~~年代的发生 ..... 远  
 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 ..... 员

学科史

- “现代”·“当代”与“五四”  
 ——新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变迁 ..... 员  
 “现代文学”的确立与 ~~员~~—~~员~~年代的大学教育体制 ..... 员  
 “当代文学”的构造及其合法性依据 ..... 员



“再解读”：文本分析与历史解构 ..... 员愿

文学史

性轳治的转换与张力

——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垣恋爱”模式解析 ..... 员愿

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

——从丁玲个案看延安文人的身份冲突 ..... 员缘

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 员愿

沈从文《看虹录》研读 ..... 员愿

摇摇附录（一）：讨论 ..... 员愿

摇摇附录（二）：讲评（钱理群） ..... 员愿

新话语的诞生

——重读《班主任》 ..... 员愿

短论

人文学的想象力 ..... 员愿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 员缘

问题意识和历史视野

——关于《转折的时代——源愿缘年作家研究》的笔谈 ..... 员愿

跋：穿越语言摇摇图绘历史

——解读贺桂梅 ..... 刘复生 员愿

## 瞧，他们走来了

### ——“ 瀟批评丛书 ” 总序

吴义勤

摇摇世纪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完成了一次巨大的历史转型，这次转型在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精神文化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困惑与创伤。而文学和文学批评则无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与牺牲品，文学的边缘化、文学中心地位的失落、商业对文学的冲击、公众对文学的冷淡等等，都使 年代的中国文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窘之中，在此情况下，文学批评的风光不再、饱受诟病也就更是自然而然的了。不仅如此，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困境还来自于其自身的压力，那就是 年代中国文学及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合谋”而形成的“繁荣”已经事实上构成了 年代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批评的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不打破这个“神话”、消除这道阴影，年代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的“真相”就会被遮蔽，就不可能得到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仅就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来说，“缺席”、“失语”的指责可谓不绝于耳。但这种指责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接近真相的呢？许多人在怀念 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的背景上，面对一大批 年代成名的文学批评家在 年代纷纷离开文学批评现场的事实，发出“缺席”、“失语”之类的感慨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不能据此忽视另外一种事实：那就是在 年代批评家离场的同时一大批 年代批评家的登场，以及这代批评家在 年代的批评业绩。真相也许是这样的：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来了，但是对上一代人怀旧、挽留、痴情甚至有些艾怨的目光，模糊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对新一代人的成长与奋斗视而不见。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策划这套“瀟批评丛书”的背景。关于 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我们不认同所谓“缺席”、“失语”之说，更不认为 年代的文学批评对比于 年代就是倒退了，相反，我

们更愿意把 20 世纪 80 年代看作文学批评回归其本体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许还够不上“超越”、“突破”之类夸张的说法，但是它前进的步伐却无疑是坚定而有力的。我们选择的十位批评家大多出生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取得了丰硕的批评业绩，他们的地位、名声和影响也许还无法与 20 世纪 70 年代那批批评家相比，但是他们有自己全新的追求，他们第一次“集体亮相”也算得上是对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的一次总结和展览。这套书不是宣言，也不是证明，而是一次货真价实的“呈现”与“展示”，这代批评家将用他们最优秀的批评文字标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藻批评丛书”最终能够面世首先要感谢的是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长。早在 1984 年深圳大学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我、洪治纲和谢有顺就有了这套书的设想，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设想被搁置了下来。1986 年 5 月份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路英勇社长和陈光新总编邀我、张清华、施战军和黄发有四位在出版社召开了一个选题座谈会，会议最后我鼓足勇气谈了这个选题，没想到得到了路社长的热情回应。他对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批评非常熟悉也非常关注，当即就给这个选题以很高的评价。后来几天，我又和路社长进行了几次热烈的长谈。我拟了这代批评家二十人的名单，最后由路社长和陈总编亲自定下了出版两辑的规划并圈定了两辑批评家的各自入选名单。就连“藻批评”这个丛书品牌也是我和路社长在长谈中确定的。在我们的理解中，“藻”时代既是 20 世纪信息时代的指称，又是一个指向未来的不确指的年代，它是告别，又是开端。而“藻批评”则应是能体现“藻”时代文学批评“标高”的批评，它应超越前人，启示未来。因此，对我们来说，“藻批评”既是“确认”，又更是一种“期待”，我们期待一流的批评，期待优秀的具有特殊“高度”的批评家。当然，我们知道，历史不是由自己书写的，“藻批评丛书”同样也不是一个历史的“定本”，它也许证明不了任何东西，但它是一个“平台”，它让这代批评家拥有了交由历史审判与选择的机会。他们就这样走来了，历史也许将会由此被改写。

“藻批评丛书”推出两辑二十本之后，在学术界和批评界引起的反响出乎我们的意料，不仅二十位青年批评家的批评业绩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与肯定，而且这套书也连续获得了山东省优秀图书奖、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会优秀成果奖等多种奖励与荣誉。很多学者、批评家从不同的方面给我们以鼓励并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而年轻的批评家朋友们更是主动来信、来电话表达对这套书的喜爱与支持。更令我高兴的是，曾在 1984 年代中国批评界独领风骚的上海批评家程德培先生也对我们这套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从两代批评家的角度专门对我谈了对这套书的建议。前辈学者以及朋友们的鼓励对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鞭策与激励，他们给了我继续把这套书编好的信心与勇气。而为了适应读者和出版市场的需要，我们也准备从今年的第三辑开始对这套书的出版方式进行一些改革：我们将不再以十本一起推出的方式出版这套书，而是分批推出，只要青年批评家的自选集达到了本丛书入选水平与要求，我们就会随时予以出版。

是为序。

1997 年春于济南

## 自序：遥远的行程

这个论文选本能够出版，完全应归功于吴义勤先生的盛情邀约。对我，这却是意外的收获，使我得以有机会整理一番十余年的研究经历。在平淡乃至平庸的日常生活当中，往往难以察觉时间的流逝，只是在翻检、挑选和阅读这些论文的过程中，才忽然发现：原来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吗？每篇文章都带着过去某一阶段某些时刻的记忆、心绪或状态，慢慢地从茫无头绪的岁月中浮现出来，于是也发现：似乎唯有它们，留住了我生命的一些已经模糊或忘却的印痕，纪录下了我学术与思想的蹒跚行程。

选本编入了我从 1985 年迄今写作的部分论文。其中有三篇是我在北大读书期间的作品。最早的一篇，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新话语的诞生——重读〈班主任〉》。这是为张颐武老师的“当代文学专题”课而写的一篇作业，当时我还是本科四年级的学生。文章的粗糙和幼稚自不待言，今天重读它，颇有隔世之感，很难回想当时写作时的具体思路。不过文章发表后的那种兴奋和快乐的心情，却一直还记得。把它收入选本，也算是对我个人学术经历的一个小的纪念。另外一篇文章是《沈从文〈看虹录〉研读》，这是我读硕士研究生二年级时候的作品。是 1989 年钱理群老师组织的“1980 年代小说研读”的课程，上课的时间好像是秋天的晚上，地点在中文系五院的会议室。参加讨论的主要是和我年级相近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那时我们大多刚刚学会操练学术语言并很有讨论的热情，因此会议室里常常唇枪舌剑。最乐意看到这种热火朝天场面的人自然是老钱，他坐在讨论桌中间，有时慷慨激昂，有时则眯着眼不动声色，我们甚至疑心他是否睡着了，哪知他却突然睁

开眼提出一两个关键问题，把发言的和没发言的都吓一跳。那时我和几个朋友是中文系著名的“烟酒生”，我们除了热衷于学术讨论，更热衷于到北大南墙外的小饭馆或咖啡馆闲聊。常常是过了午夜一群人才意兴阑珊地各回宿舍，至于酒桌上聊些什么可全都忘记了。那似乎是记忆中读书生涯最惬意和轻松的时段，作为纪念，我在选本中特意附录上了当时的部分讨论和钱老师的点评。第三篇学生作品是《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5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那时候我已经读博士二年级了。当时我参加了戴锦华老师组织的文化研究工作坊，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处理文学以外的当代文化问题的成果。正是在这个时段，我开始认真地反省自己既有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方向，并尝试“语言学转型”。印象中，坐在教室听戴老师讲课或在饭桌上和她聊天，都是极其快乐而又颇受震撼的，她的批判眼光、思想激情和新锐的理论语言都成为促使我转变既有知识结构的强大动力。如果说我确实由比较纯粹的文学研究开始向着相对广阔的文化理论视野“转向”，那么这篇文章应该算是一个重要开端。也正是带着这篇文章，我和工作坊的部分成员一起参加了1995年戴老师主持的一个有关大众文化的国际研讨会。在当代商城旁边的燕山大酒店会议室里，聚集着来自国内外的许多重要学者。这种场面对我们这些第一次参加正式学术会议的学生来说，自然是一种很难忘却的刺激性记忆。这刺激不仅有发言时几乎要到牙齿打哆嗦的紧张，还有初次在正式场合一试身手的亢奋。1996年时，《南方文坛》杂志要组一个关于我的小辑，我找到了当年参加会议并将我的文章拿到《上海文学》发表的蔡翔老师，请他写一个关于我的印象记。文章出来后，一些读到的学生，大约习惯了我平时的肆意妄言，颇有些疑惑文中我的形象，我只好很认真地帮蔡老师确证：在正式场合我真的像蔡老师所写那般，“沉默寡言”、“老成持重”。

三篇学生作品之外的其他篇目，绝大部分写作于1996年之后。这中间经历的是写作博士论文、留校任教和初为人师的适应期。尽管不曾离开生活了十年的北大校园，但从学生向老师的转变，对我这种未出过校门的人来说，仍是一个极需要心力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我要努力地在那里别人看着我和他们年纪不相上下的学生面前“为人师表”。最可笑的一次是班级劳动，我带着学生去找分配工作的师傅，人家直接就朝

着个子高高的男班长去了，认定那是老师，我跟在后面告诉师傅好几回“我是老师”人家就是不信。我要学会把学生目光聚焦的讲台当作一个“自由”发言的场所，直到今天还不能摆脱那种课前的紧张感。或许真正构成挑战的，是我明白学术从此不再是我的爱好而成为“职业”，一种安身立命之所在；我也不再是学生而成为书桌前一个或许孤独的行旅者和思考者。大约是因为这种种的紧张和焦虑（也或许无关，仅仅是我事后一种想当然的连接），~~1994~~1994年时我曾有过一次不算严重的外伤：我平地走路摔跟头，致使脚趾骨折。跛着脚老老实实待在家的那段时间前后，也是我完成《转折的时代——~~1994~~1994年代作家研究》的主要时间。现在想想，或许正是那次闭门自省，帮助我完成了真正的学术转型。应该说只有从那开始，我才彻底摆脱了学生腔，而尝试用自己的语言和问题来从事学术工作。

## 二

~~1994~~1994年之后是我比较用力地写论文的时段，因此选本中选入的绝大部分文章都完成于最近这三年时间。~~1994~~1994年的两篇，一是《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这是~~1994~~1994年到上海社科院参加关于女性文学学科建设的会议论文。尽管我并不很清楚会议的组织背景，不过还是能感觉会场上关于中国女性研究理论资源的“西化”与“本土”两种观念间的张力。这也成为我从上海回来后修改论文时主要讨论的问题。当时为了适应杂志发表的篇幅，很多细节都没有展开，文字也很枯涩。不过写完之后就很难再有心情重写了。另外一篇是《以父轅轳重叙当代史——电视连续剧 激情燃烧的岁月 的意识形态批评》。这是到海口参加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海南省作协和《视界》杂志联合举办的“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的会议论文。当时李陀老师认为批评现状的问题很大程度由于缺乏细致的文本分析所致，因此提出组织一个专门以文本分析为主题的会议。大部分会议论文分析的是小说、诗歌或批评文本，好像只有我和徐葆耕老师选择了电视连续剧。这也是我尝试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处理当代文化现象的第二篇文章。~~1994~~1994年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这年春节父母亲来北京和我们过年，我便买了许多电视剧的

影碟给他们消磨时间。没想到也算是“乡村精英知识分子”的父母，除了能够接受《水浒传》等翻拍名著，唯一愿看的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并且一边看一边互相议论，有时还要语重心长地教育在一旁陪看的我和丈夫“不要像石光荣他们那样”。这使我对这部早有所关心的电视剧产生了额外的兴趣，于是便决定拿它当“麻雀”解剖一番。

1999年大约是我迄今发表文章最多的年份，所以也选了四篇之多。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年，“奠定”了我目前学术研究的基本格局，我将之归类为“文化批评”、“思想史”、“学科史”和“文学史”。此后我的研究大致都是这一格局的拓展。《时空流转现代——从1949年到1979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是1998年参加北京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举办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的会议论文。这是我试着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处理当代文化问题的第三篇文章，用当代小说来讨论“北京”这个比较特殊的中国城市的现代想象问题。在心底里，我也想用这篇文章来表达自己对于北京的一种复杂情感。从我1989年来北大到现在，北大周边的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没有了小南门外的老虎洞胡同和便宜又实惠的众多小饭馆，没有了东门外的平房和以雕刻时光、万圣书园为中心的文化一条街，代之而起的是四环路、林立的高楼和好像施工了很长时间的工地。有时从校园出来回家，走在路边，猛然之间怎么也回想不起脚下这片地方从前有过什么，于是有一种莫名的乡愁，虽然北京这座城市很难让我有“故乡”之感。想起有一年和一个韩国朋友走在汉城（现在该叫“首尔”了）市中心的老街上，那位朋友说，走在这里让她觉得踏实和心安，因为这些老街五十年前就是今天的样子，因为尽管一切在变可它没有变。而北京似乎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几乎全部地“焕然一新”了，这也正是转变中的中国一个真切而具体的表征。于是喜欢王安忆在《时空流转现代》中那种对现代空间重组的敏感和慨叹，便选来作为标题和题记。不过编辑们似乎并不理解，发表在杂志上时这段题记和这个标题被删掉了。

《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文人的身份冲突》是1998年参加韩国圣工会大会和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第二届东亚文化论坛：东亚近现代发展中的另类历史经验”的会议论文。这是从《转折的时代——从1949年到1979年代作家研究》中丁玲一章发展出来的问题，试图讨论作为

知识分子和作为女性的革命者在身份认同上的冲突，同时也想正面提出20世纪中国历史中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的问题。偶尔回头想想，发现自己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介入居然主要是由丁玲开始的。后来发表的《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问题的历史思考》，以及也编入这个选本的《性轍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 垣恋爱”模式解析》（这里应略作说明的是，因为发表时的沟通问题，导致这篇文章有两个版本，这里的是初始版，修订版发表于《文艺争鸣》1996年第 源期。因为修订版较为压缩而初始版较为从容，故选了后版），都是由丁玲切入或生发开去的。记得有一回和朋友聊天，说起研究女性文学的人，选择萧红还是选择丁玲会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人；还有一个朋友说起她曾经极端地迷恋萧红，不过那正是她生命中颇为抑郁和自闭的时期，到后来心态越来越开放之后，慢慢开始喜欢起丁玲来。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里曾说“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在我看来，或许她自己便是这样的人。所以海伦·斯诺说她是一台“发电机”，“有无可约束的能量和全力以赴的热情”（《中国新女性》）。丁玲强悍的生命力和不断跨越疆界的激情，使她具有了与现代中国文学和现代中国历史相匹配的丰富和复杂性。这或许是我下意识地选择她作为现代文学入口的原因。

1993年的第三篇文章是《挪用与重构——1949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这是为《上海文学》给我编的一个小专栏而重新改写的博士论文概要。1995年当我选定“1949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时，我并没有那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闯入了思想史领域。我当时的考虑只是从如何挪用与重构五四传统的角度来重新清理 1949年代文学。博士论文完成答辩之后被搁置了三年，我又重新开始，不过这回是全盘推倒重来。直到现在，这个关于 1949年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课题仍在进行之中。论文选中“思想史”一栏除《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外的三篇，都是这个课题的构成部分。1998年发表的《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是其中关于“现代派”文学章节的一部分，而 1997年刚刚发表的《“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则是考虑中的书稿的一章。一个我未曾预料的历史变数是，从 1995年开始，或许导火索便是查建英那本

《~~1980~~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1980~~年），“~~1980~~年代”或“新时期”历史忽然成为了社会关注和学术研究的热点。这看起来像是被“时髦”赶了一回，不过对我来说真正的问题仍旧是如何能突破研究界既有的普遍思路和论述框架。如果说重返~~1980~~年代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向性的话，那么关键正在于如何拆解并重构那些迄今仍产生着广泛影响的意识形态框架。对我，逐渐清晰起来的一点是，讨论~~1980~~年代文学问题，不仅需要突破文学研究的边界而纳入文化与思想的历史视野，同时还需要突破那种仅仅局限于从中国内部观察问题的方式，而应纳入某种全球参照。也就是说，打开~~1980~~年代研究的新视野，更需要的是调整宏观视角。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我所面临的困难，则是如何将思想史的问题、学术史或文学史的资料清理以及理论阐释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1980~~年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是《文本分析与历史解构——重申“再解读”》。这是我参加温儒敏老师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章节的一部分改写而成。这里所谓的“再解读”，借用的是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的书名。我在这篇文章中分析的是以《再解读》为代表的、用西方文化理论阐释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研究思路的得失。在我读研究生期间，《再解读》是一本同学之间私底下传阅甚广的书，因为大家都只能共享一个香港版本，而这本书的分析思路正是我们的新时髦，我们许多人都在模仿并操练其中的文本分析方法。~~1980~~年的暑假，我接到唐小兵先生的邮件，邀请我加盟他主编的《再解读》增订本，让我确有荣幸之感。于是便把~~1980~~年发表过的《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重新修改了一番发给他，同时也将自己写的关于“再解读”的评述旧文发给他看，没想到他颇是重视，便收入增订本的附录当中了。

说起来，讨论“再解读”并不是我尝试学科史研究的第一篇文章，此前的~~1980~~年我曾发表过《“现代”·“当代”与“五四”——新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变迁》。这篇曾是博士论文章节的文章，很大部分是受我的导师洪子诚先生的论文《“当代文学”的概念》的启发而写成的。应该说，我对学科史研究的介入，一方面固然有着对自己置身的学科体制的历史反省，更重要的原因是洪老师的影响。洪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突破之一在于，他不仅关注文学作品的历史，同时也关注文学体制的历史。他的这一思路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

中得到了更为深入而详细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他对文学体制的重视极大地拓展并打开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说来惭愧，我真正懂得并领会洪老师的研究，其实是在博士生阶段的后期。而在这之前，我既被当下的文学批评吸引，又热衷于操演各种新理论术语来发表“高见”，并没有耐心做细致的史料工作和历史辨析。记得是我读硕士的时候，曾经帮助洪老师从图书馆复印《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洪平原原稿）》的原始资料。他给了我一个比后来的选目长许多的篇目单，要求我不仅复印同时也要读一读印出来的文章。不过我常常是把发黄的期刊或报纸抱到复印室就了事，甚至没有耐心把好不容易印出来的文章粗粗地读一遍。这大概让他很是失望。写作完博士论文，对我是某种转机。第一次如此艰辛而漫长的写作过程（虽然之前我写完过一本叫《批评的增长与危机》的书，但印象中并无后来写博士论文那般暗无天日），使我慢慢懂得如何使用史料和组织叙述。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领略洪老师那严谨而富于创意的研究的精妙所在。这大概是我开始“学科史”研究的开端。受聘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人都得过十分严格的一关，那就是必须在十余位系学术委员会面前做一次学术报告，接受委员们的严格审查甚至严酷的挑剔。我当时选定的题目是“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当代文学学科建制”，这份报告成为我后来有关学科史研究的基本雏形。论文选本中选入的《“现代文学”的确立与洪平原原稿年代的大学教育体制》，是参加陈平原老师主持的国际学术会议“教育：知识生产与大学体制”的论文；而《“当代文学”的构造及其合法性依据》则是我正与洪老师一起完成的一项课题中的一部分，基本意图是尝试推进洪老师有关“当代文学”发生的历史思考。

选本最后编入了刘复生兄关于我的学术评述文章作为跋，这是洪平原原稿年《南方文坛》在组有关我的批评家小辑时的作品。作为同门师兄弟，其中自然有许多溢美之词，但这篇文章于我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它第一次如此详尽、准确而深入地勾勒出了我整个研究轮廓。其中许多出自同龄人的体认，许多连自己也未曾清晰面对过的准确洞察和中肯评价，更使我体会到一种新的暖意：在我们看似孤独的行程中，其实有许多同行者和许多关注的眼睛。

## 三

描述这些论文的出处，确让人有一些回忆的快感，不过心底里却也有暗暗的自惭，惭愧于自己如此自恋。这或许是我在许多时刻要面对的一种情绪：对于自己几乎以全部身心投入的这项职业或工作，我必须时时提醒自己，它不仅是我个人的事情，我愿意它有另外的或许可称“公共性”的意义。自然，这不是简单地告诫自己“学术乃天下公器”，而是追问学术工作的意义。在今天的历史处境中，这或许不仅仅是我这样的“学院派”才会和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摆脱那种纯粹为学习或操练理论而写文章的学生阶段后，我对自己最低限度的要求是，不能“书成每为职称谋”，不能只为了写而写，而必须有自己的创意和问题意识，带入自己独立的思考。这自然是学术规范内的要求，是“带着镣铐跳舞”，不过我要求自己那“舞蹈”中必须有我的问题乃至情感。常有外行的朋友问我，每天呆在书房里读书写字是不是很辛苦，我总是很矫情地回答：要是自己喜欢的，就没什么苦不苦的了。在思路枯竭的时候，当然也会返身自问，这种书堆和文字间的岁月到底意义何在。或许正因为我所选择的这个职业和这种生活必然地要求投入精神和情感，所以如果仅仅只是人云亦云，或仅仅只做手工匠人式的知识累积的工作，至少是不够的。因此，从一种最个人主义的意义上，我把学术看作是自己表达生命体验和思想提升的“语言”。

当然，这种“语言”及其表达绝不是让人随心所欲的。随着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走上“正轨”，我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置身的学术生产体制（或称“知识生产机器”）的影响。这事实上也是 1995 年我为《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这本书编写“前言”时着力表达过的问题。在学院体制和整个学术生产体制越来越规范化的今天，如果不对我们所置身的知识生产的环境有一种清醒的认识，至少不能算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不过，认识到这种学术生产体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否认它或拒绝它。有很长的时间，我都会为自己的“纯”学院和“纯”科班出身自惭形秽，因为“学院派”似乎就意味着与社会实践的隔绝，意味着闭门造车、纸上谈兵乃至清谈误

事（如果谈不上误“国”的话）。这种对学院的反感，事实上也必然意味着对知识生产的社会条件和社会体制采取某种浪漫化、理想化乃至视而不见的态度，它除了造就出“学院派”和“非学院派”这样的道德分类外，没有任何意义。我的意思是，必须把批判学院体制、认知学院体制和有机地利用学院体制这三件事情分开。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可能是认真地讨论和认识当今的学术生产体制的真实形状，在此基础上切实有效地讨论知识分子可能发挥社会作用的方式。因此我喜欢美国学者布鲁斯·罗宾斯关于“知识分子的根基”的提法。他说，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要“探求知识分子的具体社会地位、现状及‘实例’，分析知识分子所‘依附’（爱德华·萨义德常用的一个中性词）的实际机构以及这种依附关系的政治价值，竭力辨明哪些是促使其发展的条件，哪些属于限制性条件”（《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1995年）。从这个意义上，讨论学院体制和知识生产机制的运作方式，并不是使自己“束缚”、“局限”于学院中，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的可以有效利用和发挥的文化空间。而况，在今天的中国，这种知识生产的新体制处在其高度扩张的时期，我们只要想想人文知识圈纷纷进入大学，想想学术会议、研究课题的蓬勃，大致可以窥见一斑。因此，正面地思考这种学术生产的社会环境，是探询一种可能的批判空间的必要步骤。

意识到自己生活于种种知识生产机器当中，当然绝不意味着我可以超然其外。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我只能借助这些生产环节才能将自己的思考传递出去，才能使书桌前的个人思考变为被阅读的社会成品。我的困惑在于，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拓展这份被“给定”的空间，同时我又如何被这文化空间所限。要求用自己的语言和问题来从事学术研究，是这种拓展的方式之一；不让自己为专业所限，尝试打通一些可能的学科、领域的隔绝，是我之“拓展”的另一种方式。这也是我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标示为“文化批评”、“思想史”、“学科史”和“文学史”的原因，尽管这或许有夸大之嫌。在这个分工体制越来越严密，并且从业者愈来愈密集的时代，这种跨越学科、领域界限的做法无疑是颇为费力的，不过我一直将这看作是一种拒绝被动地被学院体制塑造的方式；而同时，我还期望由此获取某种相对广阔的历史意识，而非仅仅是“专业意识”。反观自己的学术经历，一个并非我预先设计的效果是，我获得相对自觉

而成熟的学术意识的过程，也是我逐步转向“历史研究”的过程。在研究生阶段，我曾写过一些有关当代文学现状尤其是女性文学的批评文章，不过博士论文完成之后却基本上转向了历史。这个过程我曾在《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这篇短论中描述过。事实上，我一直认为那种将“历史”与“现实”分开乃至对立起来的做法是颇有遮蔽性的，它常常使人们忘记许多当下的社会、文化事件仅仅是历史的“原画复现”，同时也无法厘清许多在今天支配人们的意识形态框架和思考方式来源于何处，甚至许多现实问题其实乃是历史问题没有得到正面清算的结果。因此，我把自己的研究场地界定为“历史”与“现实”之间往返的地带。也就是说，支撑着我从事历史研究的，常常是现实的问题意识，这是我所有研究的出发点；而且，我希望也能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倒置过来，用我所“储备”的历史经验来正面讨论当下的社会轍化问题。出于此种意识，我将这个或许能够代表我迄今为止最有特点的论文的选本，命名为“历史与现实之间”。

对自己学术工作意义的思考，不仅包括我可能做什么，还意味着我将不断地思考我“做不了”什么。我始终知道并愿意去思考自己所选择的职业和生活方式如何塑造并限制我。在写着这些文字时，忽然会想到《骇客帝国》和《楚门的世界》，两部好莱坞影片中的主人公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或许类同于我与我所谓“学院体制”的关系。问题不在于“真实世界”与“幻想世界”的对比，而在于：存在一个学院体制的“外部”吗？我如何穿越并到达“外部”？最近在杂志上翻到一篇关于英国《新左派评论》杂志主编佩里·安德森的访谈，他界定了他理想中的学者——“最值得尊敬的，是能够把原创观点、一流学术与社会事务结合起来的学者”（《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第猿期）。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意味着那种穿越“内”“外”的境界。它使我心向往之。或许，这也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我将要经历更多的摸索和跨越更遥远的行程。

# 文化批评